

从玛丽女王失败看英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姜 守 明

(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 江苏 南京 210024)

[摘 要]16世纪都铎宗教改革是中世纪晚期以来英国民族主义发展的产物。它作为都铎君主专制的实现途径,不但促进了英国民族国家的建立,也体现着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玛丽女王时期的宗教反复,虽然只是14世纪到17世纪这四百年间英国民族主义发展中的一个不和谐插曲,但是,它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有力佐证,就是由于民族主义已经成为推进社会进步的主导因素,任何形式的倒行逆施都是不得人心的,她的失败就是英国民族主义的胜利。

[关键词]宗教反复 玛丽一世 宗教改革 民族主义 英国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8-0008-07

在英国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宗教改革先驱约翰·威克里夫(1320—1384年)发动的自下而上的宗教改革,到都铎君主亨利八世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再到17世纪中后期的“清教革命”和“光荣革命”,毫无疑问,宗教因素长期左右着英国的政治生活,其中隐含着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内的民族主义,这是近代早期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发展的主导力量。威克里夫从英吉利民族利益出发,极力抨击中世纪的教权主义和基督教普世主义,主张建立起摆脱罗马教廷控制的、独立的英格兰民族教会。在1414年召开的康士坦茨宗教会议上,威克里夫虽然被定为异端分子,他的著作被销毁,他的骸骨被挖出并焚烧,但是,他所弘扬的民族主义,不但奠定了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思想基础,而且激励着英国人勇敢地走上与罗马教皇分庭抗礼的道路。都铎时期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其曲折的发展过程,恰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民族主义是英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一、玛丽·都铎与简·格雷王位之争 的背后

都铎王朝正处于英国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它的开国之君,代表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经过战场上的较量,击败了以理查三世为

代表的约克家族,结束了中世纪后期以来的封建混战与社会分裂,确立起以都铎王权为标志的“新君主制”。亨利七世死后,他的儿子亨利八世对都铎王位的继承,再一次实践着中世纪以来一直发生效用的血统与神意(Divine Providence)的继承原则。作为第二代都铎君主,亨利八世统治英国将近40年,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前期(1509—1528年),他疏于朝政,仅满足于安逸与享乐的生活,各项事务主要由大法官托马斯·渥尔塞为他处理;(2)后期(1529—1547年),他因追逐个人私欲而与罗马教皇发生冲突,从此将英国引上了一条宗教改革的不归路。

亨利八世去世后,他的三个孩子爱德华、玛丽^①和伊丽莎白先后继位。爱德华王子是他留下的唯一合法男性继承人,史称爱德华六世。由于爱德华年幼,他的舅父萨默塞特公爵作为摄政委员会成员之一,以护国公的名义代行朝政。但是,爱德华一直体弱多病,未及成年就因结核病而夺命。根据1544年的《王位继承法》的规定,按血统与长幼的关系,都铎王位继承顺序应当是玛丽公主为先,伊丽莎白公主次之,她们俩是亨利八世的女儿,爱德华的异母姐姐,紧随其后的第三顺位继承人弗朗西丝·布兰登是爱德华的姑母玛丽·都铎的女儿,

^{*} 本文系教育部社科研究一般项目《英国社会转型时期宗教问题研究》(09YJA770027)阶段性成果。

^① 亨利八世和他的第一个妻子阿拉冈的凯瑟琳(1485—1536年)的女儿,与亨利八世的妹妹玛丽同名。

【收稿日期】2011-08-08

第四顺位继承人则是弗朗西丝的女儿简·格雷(1537—1554年)郡主。出人意料的是,爱德华在临终前签署遗嘱,剥夺了他的两个异母姐姐的继承权,而将王位传给了血统较远的晚辈简·格雷。根据这份遗嘱所列理由,玛丽和伊丽莎白均因她们的母亲关系,丧失了王位继承资格。

至于爱德华是在何种情形下签署遗嘱的,当时操纵着宫廷大权的又一个护国公诺森伯兰(1504—1553年)公爵对遗嘱的签署究竟施加了多大影响,人们并不清楚。不过,诺森伯兰作为这份遗嘱的副署人,惯于玩弄权术,这就不能不使人们怀疑他在爱德华签署遗嘱一事上做了手脚。至少后来发生的事情可以间接地证明这种怀疑的合理性。原来诺森伯兰担心,如果玛丽继位,他就可能失去既有的权力,甚至还会因其新教信仰,以及他曾强行中止玛丽听天主教弥撒的特权而性命不保。出于权谋或宗教的考虑,诺森伯兰假爱德华六世之手,偷梁换柱,将虔信天主教的玛丽和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一并排斥在王位之外,代之以他的儿媳简·格雷,使这位涉世未深的年轻女人被推到了危险的权力中心。

简是爱德华六世的表外甥女,10岁左右入宫,跟着监护人凯瑟琳·帕尔学习社交礼仪。凯瑟琳是亨利八世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她在亨利去世后,嫁给了爱德华的舅父,即被诺森伯兰处死的萨默塞特公爵的弟弟托马斯·西摩。1548年凯瑟琳死于产褥热或产后脓毒症,托马斯获得简的监护权。他曾筹划爱德华六世与简的婚姻,后因叛逆罪被斩首。到了1552年,国王的身体已渐渐不支,王位继承危机显现了出来。此时,大权在握的诺森伯兰开始接近简的父母,并在签署那份文件6周前,如意地安排他的第四个儿子吉尔福德·达德利爵士娶简为妻,并举办了一场集体婚礼。当时,简的妹妹凯瑟琳嫁给了萨默塞特公爵的同名儿子赫特福德伯爵爱德华·西摩,诺森伯兰的女儿凯瑟琳·达德利嫁给了亨廷顿伯爵亨利·哈斯廷斯。这样,诺森伯兰通过这些婚姻纽带,就成功地把他的家族与王族中三个最有权势的家庭联系了起来。

1553年7月10日,简·格雷加冕礼为英格兰女王,典礼在伦敦塔建筑群中央的白塔内举行,出席典礼活动的有她的公公诺森伯兰、她的父亲萨福克公爵,还有其他枢密院成员,等等。然而对于简来说,做女王是她极不情愿的事情。是的,简才

17岁,太年轻,应付不了那些国家大事,所以她哭哭啼啼地说:“王位不属我,也不能使我高兴。”但是,她无权决定自己是否做许多事情,包括接受王冠。野心家诺森伯兰已经操控了一切,包括废立王位。

后来,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简登上王位的消息传来后,玛丽公主赶紧在萨福克的弗雷林汉姆城堡宣布自己为女王。玛丽的举动受到更多人的拥护,一则因她的王族血统比简更纯正,二因则她的母亲被亨利八世遗弃而广受同情。7月19日枢密院开始倒戈,撤回了关于简的继位文告,正式宣布玛丽为英国君主,并宣布诺森伯兰为叛徒。此时,北上正欲讨伐玛丽的诺森伯兰知道一切都完了,但他还是装出高兴的样子,一边把帽子抛向空中,一边高声叫道:“上帝保佑玛丽女王!”在从剑桥郡家中被押解到伦敦时,诺森伯兰向新女王玛丽屈膝求饶,但为时已晚。同年8月22日,他被送上了绞刑架^①,而他的儿子和媳妇则双双被关进了皇家监狱伦敦塔。简如愿以偿地退位后,她天真地询问枢密院是否可以让她离开王宫回家。深陷宫廷斗争漩涡的简哪里知道,失去王位即失去自由,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沦为宫廷斗争的无辜牺牲品。

二、英格兰女王玛丽的天主教情结

简·格雷(实质是诺森伯兰公爵)和玛丽·都铎的王位之争,既是一场激烈的宫廷权力斗争,又是一场新旧教之间的地位冲突。都铎时期,亨利八世为追逐个人私利而断绝与罗马教廷的一切关系,引发了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不过,亨利八世把英格兰教会从天主教会分裂出来,不是要改变它的教义与仪式,而且是要使他自己成为教会的主人。当时英国官方的宗教一直徘徊在新旧教之间,他只不过取罗马教皇而代之,使自己成为英格兰教会的“至尊领袖”。亨利八世死后,英格兰的宗教问题,即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对立日益严重,借助于残酷的宫廷斗争表现了出来。

1553年8月,当玛丽以合法的英格兰女王身份进入伦敦时,受到市民们的欢迎。当然,英国人之所以普遍地接受玛丽,并不是由于她的天主教信仰,也不是由于她的一半的西班牙血统,而是因

^① 诺森伯兰的父亲爱德蒙·达德利担任过亨利七世的财政大臣,后来是被亨利八世处死的。

为他们珍视和平、向往秩序,以及维护英格兰民族传统。在英国人的眼中,简不过是个王位僭越者,而玛丽才是都铎王位的正统继承人,因为在王位继承问题上,血统与神意这两个原则最为重要。可是,玛丽的不平凡身世和一半的西班牙血统,决定了她的天主教徒的与西班牙的双重狂热秉性。玛丽继位以后,立即着手推翻其父亨利八世、其异母兄弟爱德华六世两朝颁布的宗教改革法令,恢复其臣民的天主教信仰,恢复其统治下的英格兰对罗马教廷的服从。

首先,玛丽一方面释放和重新任用曾因反对宗教改革而被捕入狱的天主教首领,另一方面又逮捕力主宗教改革的新教领袖。为了稳固受到挑战的王位和控制混乱的政局,她一上台就从伦敦塔里放出了亨利八世时期的保守派首领诺福克公爵、斯蒂芬·加德纳博士,恢复了后者的温切斯特主教职位。此外,还恢复了约克大主教希思、都尔汉主教汉滕斯托尔、伦敦主教邦纳、奇切斯特主教戴和伊利主教瑟尔比等天主教职。另一方面,又把倡导新教改革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温切斯特主教庞内特、伦敦主教里德利、奇切斯特主教斯科利等投进了伦敦塔、弗利特(Fleet)^①、马夏尔西(Marshalsea)^②、新兴门(Newgate)^③、高等法院等监狱。1553年10月1日,威斯敏斯特宫举行加冕典礼,玛丽正式成为英格兰女王。为了统一意志,玛丽旋即改组枢密院构成,使之完全听命于自己^[1](p.532)]。

其次,取消爱德华六世时期的改革法令,将英格兰教会恢复到《六信条》规定的状态。尽管亨利八世末年批准的《六信条》及《国王书》等文献坚持对天主教教义与仪式的固守,但是,英格兰教会已经摆脱了来自罗马的教皇权,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外来的新教思想对英国普通民众的影响日益明显,所以到爱德华六世驾崩时,虽然英格兰的“大多数人民尚非热心的基督新教徒,但他们也不再是热心的天主教徒”^[2](p.367)],这一点无可争辩。加冕4天以后,玛丽时期的第一届议会宣布了亨利八世和阿拉冈的凯瑟琳的婚姻的合法性,同时确认了玛丽继承都铎王位的正当性。这届议会还通过了玛丽时期的第一个取消法案,即“取消爱德华六世在位时期制定的某些法令”的法案^[3](pp.402-405)]。该法案指责爱德华法令径自杜撰了一些离奇的东西,改变了英格兰人祖先确定的天主教礼拜仪式,转瞬间使英格兰王国发展到极其危险、极其混乱不堪的地步,因而全部予以废除。被废止的爱德华

时期的宗教立法,涉及圣餐礼、主教选任、第一和第二统一法、废除偶像、任命牧师、信守宗教节日和斋戒期、教士婚姻及其子女合法性等宗教教义与礼仪方面的实际内容。同时它还明令,自1553年12月20日起,在英格兰和女王陛下的一切其他领地内,恢复亨利八世在位末年所处的宗教状况,即认同不存在教皇权的天主教。

再次,与西班牙的菲利普王子,即后来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联姻,确保天主教在英国的统治地位。就在玛丽加快恢复天主教和回归罗马之际,王位继承人与女王的婚姻问题浮现了出来。早在婴孩时代,玛丽即依从父命,曾与法国王太子订婚,又与米兰公爵、奥兰治公爵、匈牙利国王、苏格兰国王、葡萄牙的唐路易、巴伐利亚的菲利普等欧洲王室贵族谈过婚事,甚至还曾与其表兄,菲利普王子的父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订婚^[1](p.535)]。这些联姻的谋划都流产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玛丽十七八岁时,她的身份发生了突变,即由合法的公主变成了非法的私生子。可玛丽从内心深处就不曾接受过私生子这个污名,只知道自己就是她母亲的合法女儿。不过,她当时对自己的不幸处境也无可奈何:“除了好话,什么也得不到。只要我父亲活着,我就只能是玛丽小姐、基督教世界最悲哀的小姐。”^[4](p.240)]入主伦敦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说玛丽不若天仙般那样楚楚动人,但对于早已错过谈情说爱年龄的英格兰女王来说,她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未嫁公主,而是一个年届不惑之年的老姑娘,一个统治着无数臣民的未婚女王。

对于女王的婚姻,国人都希望玛丽能在其臣民中物色快婿,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一是约克家族后裔德文伯爵(1527—1556年),一是红衣主教雷吉诺德·波尔(1500—1558年)。前者有王族的血统,和玛丽、伊丽莎白、爱德华以及苏格兰的詹姆斯五世都是远房表兄弟姊妹关系,他的父亲曾在亨利八世宫廷具有显赫的地位,他的母亲一直保持着与阿拉冈的凯瑟琳的友谊。后者则是

① 位于弗利特河东岸,坐落在伦敦的法灵顿大街。1197年初建,先后毁于1381年的农民战争和1660年的伦敦大火,毁后两次予以重建,1844年最终关闭。

② 位于伦敦的泰晤士河南岸,在萨瑟克自治市境内,存在了5个多世纪。

③ 位于伦敦的新兴门大街,建于1442年,屡经修缮,1902年拆毁。

爱德华四世的兄弟克拉伦斯公爵的孙子，他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后因反对至尊王权、反对亨利与凯瑟琳离婚而流亡国外。波尔在信仰上与玛丽一致，是忠实的天主教徒，但他已经53岁，年龄似乎偏大。即使有条件与女王结合，他要让玛丽生孩子恐怕不是易事。

君主的婚姻不是儿戏，而是与王位的继承、社稷的安宁息息相关的国家大事。玛丽对婚姻问题自有谋划。一方面，她不希望未来将王位传给伊丽莎白，因为这一对异母妹妹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伊丽莎白的母亲安妮·博琳不仅是她母亲的情敌，也是她本人所深恶痛绝的仇人。因为伊丽莎白降生后，玛丽就于一日之间变成了一个私生女，而且，安妮还迫使玛丽当侍女，让她照看襁褓中的伊丽莎白。玛丽继位时已37岁，她急于寻找一个配偶，一是能让自己有个美好的归宿，二是希望生个男孩，以此排斥她的异母妹妹伊丽莎白的继承权。这种考虑在情理之中，但出人意料的是，她完全不顾枢密院和议会的请求，将德文伯爵和波尔一并排除在外，而是从西班牙大使雷纳德提出的8位候选人中选择了鳏居的菲利普王子。菲利普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和葡萄牙的伊莎贝拉的儿子。不过对于英西联姻，包括玛丽的主要谋臣加德纳主教在内，国人持普遍的反对态度，因为前有亨利八世与凯瑟琳婚姻的教训，后有英格兰将被欧洲强大的哈布斯堡家族蚕食鲸吞的顾虑。正当英国议会准备讨论婚约条款时，爱国志士托玛斯·怀亚特爵士（1521—1554年）在罗切斯特成功发动起义，反对玛丽嫁给一个外国人，目的就是保证伊丽莎白将来能登临英格兰王位。

面对数千人大大起义，玛丽女王既固执己见，我行我素，又显得十分镇静，并于2月1日在伦敦圣保罗教堂发表演讲，宣称英西联合的正当性，要求信教的臣民对她作为君主保持忠诚与服从。玛丽赢得了人们的同情，起义很快平息了。除了怀亚特爵士、萨福克公爵和100多名起义者被处死外，一直囚禁在伦敦塔的萨福克公爵的女儿和女婿因受怀疑而被送上了断头台。这样，有“九日女王”之称的简·格雷，就成了英国历史上最短命的女王。伊丽莎白公主也因被怀疑而关进伦敦塔两个月，此后一直被软禁在伍德斯托克城堡家中。

又次，取消亨利八世的重要改革法令，包括1534年的“至尊法”，恢复英格兰教会和英格兰民族对罗马教廷和教皇的服从。怀亚特起义未能改

变玛丽的意志，相反，起义失败则加速了英、西王室联姻的进程。论辈分，玛丽比菲利普长一辈，论年龄，女王长王子11岁之多。玛丽之所以把菲利普看作白马王子，横下心来要嫁给自己的姨侄儿，无非是希望他们的婚姻所带来的继承人能够阻止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的王位继承权，从而保证天主教的正统地位。1554年7月25日，婚礼如期在温彻斯特大教堂举行。同年11月，玛丽的议会还通过议案，撤销了亨利八世时期褫夺红衣主教雷吉诺德·波尔公权的判决。波尔长期游历于意大利，为教廷效劳，1536年由保罗三世授任红衣主教，还差一点没成为教皇。现在，尤利乌斯三世推举他作为教皇特使，前往不列颠谈判，试图让英格兰教会回归罗马教廷。为此，英国议会通过关于撤销自亨利八世在位第20年（1529年）以来一切反教皇权威的法令和部分爱德华六世法令的法案，接受被亨利和爱德华所废止的教皇权。这就是玛丽的第二个取消法案的主要内容。该法案声称英格兰教士和俗人“偏离了对罗马教廷的服从，脱离了基督教会的统一”，仁慈的上帝使徒教皇和教廷派遣自己的代表到英格兰王国，“再次召唤长期在外流浪、徘徊生活的英格兰人民走上正确的道路、返回家园”，英格兰人民应向红衣主教波尔悔罪，并经由他接纳和投入基督教会的统一和怀抱之中^{[5]（p.170）}。11月底，英格兰教会举行仪式，在波尔的引领下现实与罗马教廷的和解，确认教皇的至尊领袖地位，完全恢复到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以前所处的状况。1556年，波尔出任英格兰教会史上最后一位坎特伯雷大主教。

最后，重新公布惩治异端法令，大肆迫害反天主教的新教徒。“为了表明英格兰如何完全地使自己与其所爱的教会的和解，议会着手恢复反对异端的旧法案”，从而使英格兰“重新拥有焚烧那些捍卫威克里夫主义的福音派基督徒的特权”^{[6]（p.374）}。根据玛丽女王颁布的天主教令，英国的新教徒面临着或流放、或改宗、或惩罚等几种痛苦的选择。许多有钱的新教徒选择了流放，大约有800多个富人逃离不列颠，到了德意志的法兰克福、瑞士的苏黎世和日内瓦，在那里追求宗教自己的属灵生活。同时，根据教皇代表、红衣主教波尔的指令，1555年2月，由加德纳、邦纳滕斯托尔等6名高级教士组成了一个特别宗教法庭，审讯被囚禁的新教徒和持不同政见者。第一批有4个人为新教信仰而献身，他们是2月4日在斯密斯菲尔德被烧死的《圣

经》翻译者、圣保罗大教堂讲演者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 2月8日在考文垂被烧死的伦敦教区牧师劳伦斯·桑德斯(Lawrence Sanders) 2月9日在格洛斯特被烧死的爱德华六世时期格洛斯特和伍斯特主教胡珀(John Hooper)和2月9日在奥尔德姆·康芒被烧死的萨福克的哈德利教区牧师罗兰·泰勒(Rowland Taylor)。火刑柱一旦架起来,焚烧异端分子的烈焰就会向四周蔓延。在1555—1558年短短的4年中,总共有284人,包括56名妇女在内,因所谓的新教信仰遭到了惩罚,其中除30人死于监禁外,大部分则是被活活烧死的。凡有异端嫌疑者,不论男女老幼,皆不得幸免。在那些殉难者中,既有大主教、主教和一般教士,也有织工、学徒、屠夫、渔民、理发匠,共有21个教士被烧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伦敦主教里德利和伍斯特主教拉蒂默也在其中。

三、玛丽女王失败的民族主义解读

玛丽女王之所以能在新教基础较好的英格兰恢复天主教,是以一定的社会背景为基础的。起初的英格兰宗教改革是以加强王权、反对教皇权为主要目的的,而不以改革天主教教义与仪式等实质性内容为依归,因而英格兰教会与天主教之间的差异也仅仅是形式上的,在内涵上两者没有根本差别。但是,1530年代亨利八世推行的中庸之道,不但为新教改革创造了条件,也给反宗教改革留有余地。玛丽女王上台后,不顾英格兰的民族和民族利益,一步步地实施复辟政策,就是恢复天主教、迫害新教、接近西班牙和回归罗马。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看待玛丽的最终失败呢?

第一,恢复天主教,严重损害了英格兰民族情感。自宗教改革以来,(罗马)天主教已经成为侵入英国的外来势力的象征,而被否定的罗马教廷和教皇权也不再具有普世的意义。玛丽的信仰源自小时候家庭的熏陶。20岁左右,她拒绝承认亨利八世为英格兰教会的“至尊领袖”,一因她父母的婚姻危机而憎恨父亲,再因她接受的天主教信仰使然。她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不能接受后来的新教,这是可以理解的。经过亨利和爱德华两朝的改革,天主教作为外来入侵势力已经受到排斥,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教获得了初步发展,而玛丽回归天主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诺森伯兰曾竭力阻挠玛丽继位,虽然其中掺杂着其个人私欲,但是,他的动

机之一就是担心让一个天主教徒成为女王。爱德华时期,激进的英格兰新教改革正是在诺森伯兰操纵下进行的。玛丽上台后,或出于报复的心理,或是出于宗教的狂热,急于推翻乃父乃弟的新教政策,让英格兰教会重新回到罗马天主教的状态,这就违背了英格兰民族的根本利益,从而丧失了她作为一个都铎应当获得的英格兰人民的支持。

第二,与西班牙联姻,严重伤害了英格兰民族情感。论年龄,菲利普比玛丽小11岁,论辈分,菲利普比玛丽晚一辈,是玛丽的表侄儿。他们的结合,完全是一种封建式的政治联姻。虽然如同对新教徒的恨一样,玛丽对菲利普的爱是真诚的,也是执着的,但是玛丽并不幸福。婚后一年多,她没有真正怀过孕,而只有对怀孕生子的强烈愿望,或者置身于自己臆造的幻境之中而不能自拔。原来,由脑垂体瘤引起荷尔蒙紊乱带来了某些身体症状,她误以为那就是满心期待的大喜的吉兆。菲利普不是为了爱情,而是利用玛丽的情感,“完全是为了确保英格兰支持他在欧洲大陆的霸权而与玛丽结婚的”^[4](p.244)]。这桩婚姻给英国带来的是战争、灾难和耻辱。1555年9月,菲利普回西班牙去继承王位,直到1557年春天才回来。这一次,他把英国拉上西班牙战车,让英格兰人为着西班牙人的利益而与法国人开战。这场战争不仅耗尽了英国的人力和财力,而且一无所获,除却痛失加莱——英国从百年战争中获得最后战果,“英格兰王冠上一颗璀璨夺目的珍珠”,更使英格兰民族感情受到了极大伤害。

第三,大肆迫害新教徒与焚烧异端,最终在历史上留下了“血腥者”的骂名。玛丽复辟天主教时期,英国的新教徒面临着几条可供选择的道路,虽然这些选择对他们来说都是痛苦的:要么放弃新教,皈依天主教;要么坚持新教,面临惩罚;要么忠于新教,逃离英国。固然大部分人屈从于玛丽的意志,从新教转向了天主教,真正选择后两条道路的人并不多。但是,这并不表明英国人普遍认同天主教,对于英国的新教徒而言,天主教是与教廷画等号的,不论是其对新教信仰的坚持,还是选择逃离不列颠,都是英格兰民族主义的反映。玛丽通过君主的淫威,让许多人从形式上放弃新教信仰,但她却无法让那些通过赠予、购买、转让等途径占有教会财产的俗人,自愿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尤其那些新教徒,事实上,是玛丽宗教复辟政策的坚定反对者,或者说是英格兰民族利益的坚决维护者。

民族意识觉醒,是英国民族国家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不论亨利八世的动机多么单纯自私,他的政策或左或右,但民族主义的倾向十分鲜明,所要达成的目的就是加强英格兰王权。亨利八世本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反对普世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不论萨默塞特公爵多么傲慢而又软弱,也不论诺森伯兰公爵多么奸诈而又卑鄙,他们所处心积虑推动的新教改革,迎合了正在觉醒的英格兰民族意识。“伊丽莎白可以让新教和旧教在英国同时并存,但她的至尊君主地位是不能受到丝毫动摇的,为此她坚决排斥包括教皇权在内的一切外国人势力,因而成功了。英国人可以随着君主的意志来选择或更改其宗教信仰,关键在于他们的君主必须维护英格兰民族利益。”^{[7] (p.27)}相反,玛丽的悲剧在于,她从未意识到她的臣民把天主教、天主教的西班牙,以及天主教的罗马教廷统统视为外来势力的影响,这种看法虽然肤浅,但是却日益深入人心。“玛丽女王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她违背大多数英国人意愿,没有担负起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独立的历史责任。”

“作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表现形式,宗教改革体现了欧洲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形成时期世俗王权对僧侣统治的反抗,是世俗君主国反对天主教会一统天下、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途径。”^{[8] (p.234)}然而,玛丽·都铎以其天真、任性和固执统治英国,她却并没有看清,也无法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自16世纪30年代英国与西班牙、与罗马的关系恶化以来,民族主义已成为影响英国政治发展的主导精神。玛丽之所以走上一条背离英格兰民族主义之路,除了家族的恩怨之外,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复杂的成长环境、虔诚的天主教信仰,狭隘的报复心理,甚至还有个人的狂热偏执,这一切共同促使玛丽将她自己推到了英格兰民族的对立面。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一个众人之上的君主,和一个缺少自信的女人,玛丽始终没有赢得“上帝的恩惠、其臣民的忠顺和其丈夫的爱”,其短暂的统治,是都铎英格兰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一段不协调的插曲,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玛丽的身体一直很虚弱,她还对菲利普心存幻想。1558年8月28日,菲利普离开英格兰,永远

地离开了一个多病而又不幸的女王。同年11月17日上午,在红衣主教波尔死前12个小时,玛丽带着忧郁、耻辱和绝望死去,终年42岁。但是,玛丽至死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失败。临终前,她竟然还要求伊丽莎白继位后,不要改变其既定的天主教信仰^{[9] (p.103)}。这真是有点痴人说梦的味道。随着玛丽女王和红衣主教波尔的死,天主教永远失去在英国的统治地位。而“玛丽女王,对宗教改革反动所引起的唯一后果,就是使大多数英国人都激起对女王所点燃起来的天主教信仰之火的强烈仇恨”^{[10] (p.114)}。这正如克莱顿·罗伯茨和戴维·罗伯茨所说的那样:“玛丽的悲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她的心中唯有西班牙和天主教,而其臣民的心中唯有英吉利和新教。”^{[11] (p.285)}玛丽菲利普二世心存幻想,她让国人回归天主教信仰和重新投入罗马教皇的怀抱,极大地伤害了英格兰的民族利益,她的失败则是历史的必然。

【作者简介】姜守明,男,1959年生,江苏盱眙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史和西方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 李婷轩】

参考文献:

- [1] J. D. Mackie, The Earlier Tudors, 1485- 1558 (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M]. Oxford, 1957.
- [2] [美]C. 罗伯茨和 D. 罗伯茨著,贾士衡译.英国史 上册[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
- [3] G. R. Elton (ed.), The Tudor Constitution: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M]. Cambridge, 1982.
- [4] [英]安东尼娅·弗雷泽编,杨照明,张振山译.历代英王生平[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 [5] J. A. Froude, The Reign of Mary Tudor (Series of Every Man)[M]. London, 1924.
- [6] Thomas M. Lindsa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M]. vol. I, [Scotland] Edinburgh: T. & T. Clark, 1908.
- [7] 姜守明.现代化、全球化与世界历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 [8] 姜守明.从复古意识看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本质[J].学海, 2007(6).
- [9] F. G. Llewellyn, The Tudor Sovereigns and the Reformation [M]. London, 1938.
- [10] [英]查尔斯·弗思著,王觉非,左宜译.克伦威尔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11] Clayton Roberts & David Roberts, A History of England[M]. Vol. I, New Jersey, 1980.

(下转第57页)

因比所赋予历史的意义就在于解决西方文明甚至整个人类的困境问题。对于人类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意义更为重大了”^[13] (p.88)。当一个文明遭遇物欲膨胀、生态失衡、精神空虚等危机之时,汤因比宗教观的深刻影响与借鉴意义就更为凸显。近年来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张惠娜就借鉴汤因比的宗教观,提出“生态危机的宗教解救”说,认为汤因比对人类中心的反思和“高级宗教”论对应对生态危机很有意义^[14] (p.30)。晏可佳早在二十年前就指出,汤因比的神学史观从宗教入手研究历史,“试图为西方文明提供一条救赎之道”,也为“所有步入现代化社会的非西方文明”寻找出路提供了启示^[15] (p.62)。不难预料,汤因比的宗教文化观在我国社会新的转型时期会遇到更多的思想知音,未来中国也许会如汤因比所期望的那样在世界文明史上发挥主导作用^[11] (p.87)。

【作者简介】冯小茫,男,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柳文全

参考文献:

- [1] 马秀梅. 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宗教学再探讨[J]. 青海民族研究, 2005(1).
- [2] 汤因比著, 刘北成, 郭小凌译. 历史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版社, 2000.

- [3] 汤因比著, 晏可佳, 张龙华译. 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 [4] 郭长刚. 文明核心、文明碰撞与文明衰落——对汤因比文明理论的若干思考[J]. 学习与探索, 1996(5).
- [5] Wainick, Morris. "Toynbee against the Pagans" [J]. The Antioch Review. Vol. 7. No. 4 (Winter, 1947).
- [6] Nichols, J.H. "Religion in Toynbee's History" [J].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Vol. 28. No. 2 (Apr., 1948).
- [7] Africa, Thomas W. "The City of God Revisited: Toynbee's Reconsiderations" [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23. No. 2. Jun., 1962).
- [8] 张志刚. 宗教学是什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9] Navari, Cornelia. "Arnold Toynbee (1889- 1975): Prophecy and Civilization"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2 (Apr., 2000).
- [10] Doran, Robert. "Introduction: Terrorism and Cultural Theory: The Singularity of 9/11". Substance. Vol. 37. No. 1. Issue 115: Cultural Theory after 9/11: Terror, Religion, Media (2008).
- [11] 许启贤. 评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89(6).
- [12] 陈玉霞. 论汤因比的宗教文化思想[J]. 学术交流, 2004(12).
- [13] 邵鹏. 科学性与宗教性的双重变奏——汤因比思想理论的矛盾再探讨[J]. 燕山大学学报, 2008(4).
- [14] 张惠娜. 生态危机的宗教解救——汤因比生态伦理思想述评[J]. 唐都学刊, 2008(3).
- [15] 晏可佳. 汤因比神学史观初论[J]. 复旦学报, 1991(1).

Toynbee's Religious Cultural Ideology

Abstract: Religion is the core issue in understanding Toynbee's views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covering his thinkings on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religion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religion and politics, religion and civilization, religion and humanity. Especially his thoughts in the mature period of his studies are more closely related with religion. In this essay, historian Toynbee's religious views and his religious cultural ideology are concisely outlined, through summing up his religious cultural concepts and ideas in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Key Words: Toynbee, Religion, Civilization, History

(上接第13页)

Talking on the British Nationalism from Mary I's Failing

Abstract: The Reformation,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Tudor Dynasty, was the product of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nationalism. As a way to the absolute monarchy, it not only promoted establishing of the English national state, but also embodied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the British historical progress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of England. Although the Count-Reformation in the reign of Mary I was a disharmony interlude in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British nationalism in the 14-17 centuries, but it became absolutely a kind of forceful evidence that the nationalism had become a dominating factor to impel the British social progress, and all the actions contrary to advance of the times would inevitably be unpopular. Mary I's failing was the victory of the British nationalism.

Key Words: Count-Reformation, Mary I, Reformation, Nationalism, Britain